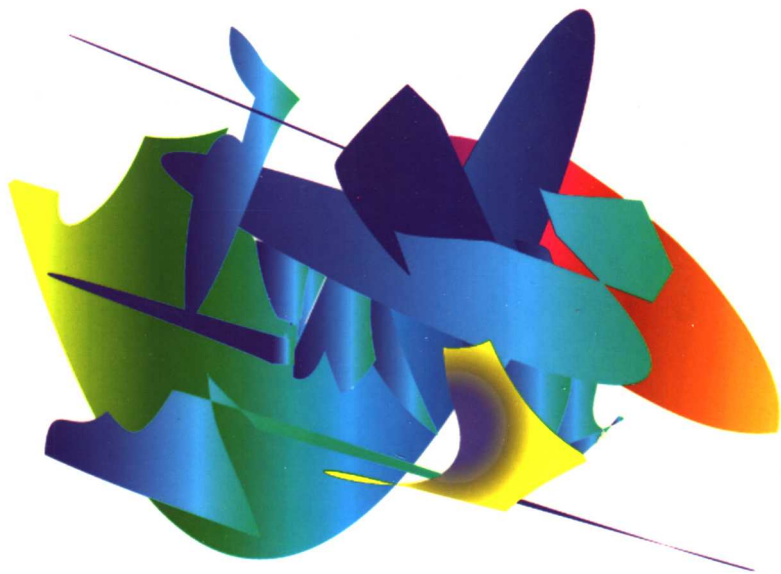


现代与传统丛书

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主体性的困惑

王 宾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与传统丛书

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主体性的困惑

王 宾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冯 巽
责任编辑：余小华
封面设计：张永齐
责任技编：黎碧霞

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主体性的困惑

王 宾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方正电脑排版印务中心排版

广东佛陶印刷厂印刷

(厂址：佛山市石湾镇忠信路9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3.625印张 330,000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8-02945-0/B·77

定价：23.8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1084 83790667

此书谨献给

已故恩师戴镠龄先生

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这套丛书收录的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决定取舍的首要条件在于是否真正的学术著作。人类是随着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和提高而成长的，钟爱学术就是珍视人类的未来，戕害学术，以伪乱真，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卑劣伤害。

思想闪光，学术真知，源于自由心灵的翱翔和碰撞。千年一贯，亿万同音，调同腔同，创新生机消磨殆尽，这类中世纪的遗毒应该连根铲除。现代社会是以思想和学术自由为标志的。进入我们这个园地，相应地有个严肃的规矩：珍视自己的脑袋，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苦跋涉。真正的学术著作是联结已知与未知世界的形质各异的铺路石。从小小的单篇论述到长篇巨著，都应在人类文化积累的永无止境的征途中留下自己大小不等的印记。一个学者如果经受不住心灵的孤寂和思考的痛苦，不能坦然对待飞来的横逆和尘世的喧嚣，而冀图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多半是一枕黄粱。他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不过是发现和创新的喜悦与傲骨的增长，以及来自读者的真诚理解。这套丛书就是为分享这些探索者的甘苦而存在的。

世界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当代牵动世界的大事莫过于占

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在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后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是本丛书优先关注的课题。

这套丛书出版之初，曾获霍英东基金会慷慨支持。当时有关人士说了一句话：“你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我一再思考着这句话，企盼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秉着这个宗旨携手共进。

1995年春于广州中山大学

序

——为“后现代”正名

本书的正题“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有追逐轰动效应之嫌；副题“主体性的困惑”则摆出一尊思辨的姿态。合在一块仿佛暗示了学术的商业化。不过，这并不是笔者或编辑无中生有而营造的气氛。一个不愿承认的事实，被合盘端出而已。在当今世界，又有哪一本书能逃脱“消费品”的命运？连净化灵魂的宏伟叙事都要通过行政或商业包装炒作，方能顺利进入文化市场，我这一介草民的涂鸦那有本事伪装纯洁虔诚！挑明了，说白了，至少可以坦然面对读者：符号与事物，包装与货品，从来就不一致，本书也少不了“水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罢了。当然，这又变成一种倒过来做的商业广告。两难呀，后现代学术的命运！

说得典雅些：本书收入的文字，记录了笔者近几年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将出路渺茫的原因归于主体性困惑，最后又以“后现代”符号来概括。说得难听一点：它只不过是各类话题和互相否定的观点拼贴到一起，以“大杂烩”的方式推向学术市场。唯一可令我心安理得的是：“拼贴”正是标准的后现代姿态。既然 MTV 可以将风马牛不相及的音乐／歌词／画面压缩到单一的空间，提供一种前所未闻的快餐文化且让十几亿中国人吃得津津有味乃至神魂颠倒，那么，对涉及“现代”和“后现代”的说不清又非说不可的种种问题，可不可以如法炮

制一下呢？试一试如何？于是，出版社和丛书主编决定网开一面，接受了这本无中心主题贯穿、无主导话语控制、无方法论统辖、各篇之间观点相左乃至互相解构的拼贴型文化制品。

为什么不像有些理论家那样，通过“客观”描述和主观批评后现代文化，来建构自己的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体系”，从而两边得利，成为双料专家呢？不可以的。这有违本人的学术品性。学术水准，有赖于他人判断；学术品性只有自己知道。这个被商品反复浸染的大社会中，知识分子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飞地”，不是道德理想主义，而是诚实地对待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果失去了这块“飞地”，轻则舒舒服服或麻木不仁地接受“异化”，并收取“名人”、“导师”和“专家”等廉价头衔；重则挥舞假大空的棍棒去敲打拒绝“异化”的同类。这难道不是“学术”圈内司空见惯、比商场更黑暗的现状吗？知识分子控制他人的秘密武器，不是金钱和由官位决定的政治权力，而是“知识的化身”、“导师的光圈”、“话语体系”、“方法论权威”等等。这难道不是问题吗？我无力以体系的方式来揭示体系的神话。我只能以无体系的拼贴来象征自己的立场。这是“弱者”求生存的方式，不是“强者”指点江山的本领。

拼贴了一些什么？得事先有个交代。学术毕竟不是 MTV。

本书选录了这几年笔者在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文学、文学批评、哲学、语言学、政治学、大众文化等。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我都不是专家类的人才。鼓足了勇气吹牛，也只敢说是个“跑龙套”的角色。这是正统学术的大忌。我犯了忌，而且是故意犯忌。因为我按捺不住对问题的兴趣，执着地跟着问题走，窜到不属于自己的领地讨饭吃，稍有体会便得意忘形，忍不住要指手划脚言说一番。文章一发，要么冒犯他

人，要么得罪自己——我对自己的观点有朝令夕改的坏毛病。短短几年内，我曾站在现代启蒙者一边，痛砭人文精神的失落，为终极关怀摇旗呐喊；转过身，我又愉快地接受主体性的消解，挖苦当代精英的武断幼稚。通过对比研究，凸显苏格拉底“牛虻”式独立人格的现代意义，却又心甘情愿悬搁独立人格以化解到文本之中去。用西方分析法来清理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又断言分析法为西方逻各斯中心观隐藏了一个非法的“先验主体”或“先验所指”。我从心底里佩服解构主义的洞察力和彻底的批判精神，但是在使用这种阅读策略时往往掉过头来针对解构本身，甚至因循怀旧的心迹，提出“重返结构”的主张。有时依托老庄的大旗当虎皮，摆出大智若愚的架势，有时又全凭小聪明抓住对方的逻辑谬误一槌子定音。批判等级二元，又从来离不开等级二元。以独断论的方式来挑战独断论的理念。毫不留情地鞭斥民族主义狂言妄语，而在述说中华文化时又按捺不住种族中心观的躁动。憎恶西方学术规范的霸权统治，又处处依靠这一霸权来指责自己的同胞。总之，不知不觉地与自己认同的观念拉开了距离，同时又与自己要批评的对象暗中“调情”。分开来读，一篇篇文章似乎还有棱有角，有时还气势凌人。合到一起，就会互相打耳光子。如果说有一条什么“主线”贯穿了这几年的思考，那就是对问题的矛盾心态。这也叫学术？我不去追问。原因何在？主体性的困惑。我不可能围绕“困惑”的题目，分章分节逐层剖析。那将意味着没有困惑，意味着超越了自己。（“超越自我”，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的大神话。骗人骗己，我都有份参预）我只能用拼贴的方式，让困惑从各篇文章之间的观点冲突中去显现。必须强调，对现代性而言，是没有主体性困惑的。主体是“上帝死后”的主宰，既为自然又为自己立法，而且还能信心十足地展望尽善尽美的未来人间天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后现

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一文的题目为全书正题。在两种“性”之间的摇摆或曰思考，这本身就是一种指向后现代的情结。我大胆猜测，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顺便提一笔，在以迷信领袖万能为思想基础的“文革”专制时期，是不会有真正的困惑的，因为可以从“伟大领袖”这个“最后因”中得到解释。困惑是开放时代的标志，是中国式“后现代状况”的产物。无此困惑，我将是行尸走肉。

为“后现代”正名，不能按“现代”的方式去界定它是什么。只能用它不是什么来言说。这与现代语言学揭示的“意义如何是可能的”道理完全一致。要求概念的清晰，正预设了反“后学”者们的现代性立场。以对方要质疑的东西（概念的透明清晰和确定），来回击对方的挑战，这正是现代性张扬者们所犯下的一个违背了现代性的逻辑谬误。术语称“窃取论题”或“预期理由”。后现代没有一以贯之的体系——它本身就是反体系的。它没有固定的方法论——方法论是现代性的标志。当代西方的学术成规要求对一个特定问题展开多侧面的探究，然后将发表或收集的各篇文章拼成一集。而我们却跳不出黑格尔的阴影，不论则罢，一论就要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面面俱到，文章没发表几篇，专著却出了十几本。前者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后现代方法，后者是现代乃至前现代的，其共同特征是：还没有过河，便知道如何过河，且知道河那边是什么乃至应该是什么。还可以用许多“不是什么”来描述后现代。最要紧的是：它绝对不是中国大陆黑格尔的传人们——无论是直立的还是“颠倒”的黑格尔——所指责的“精神垃圾”。它绝对不是他们断言的只有在完成了现代化大业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文化现象。我们已处在后现代状况之中。“我们”，包括了象牙塔内的哲学家和“三资”企业的

仔。

“后现代”虽然无法界定，但是它关心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理论层面的核心问题是：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并且通过文化扩张为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广泛认同的启蒙理性和“先验主体”是否合法合理？通俗地讲：人可否超越他身处的共时性文本（语言、文化、社会、历史、各种成规等等），站在文本之上或者置身于文本之外来批评文本、启蒙他人？主体性确立，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拷问它的合法性，是后现代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严肃、意义深远的哲学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人文其他学科的立论根据。不可以因对当下某些紧迫的现实问题之合理的关注，而悬置乃至阉割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读一读当今中国大陆对“后现代”的十字军式的讨伐文字，实在乏味得很呀！全是唐吉珂德斗风车式的喊叫。说了一大通，就是回避“先验主体”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我曾对现代启蒙派（也是对自己）发问：启蒙者由谁来启蒙？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的灵魂，谁来照顾？如果“天下皆醉，唯我独醒”，那阁下不就是“上帝”或“圣人”？如果诉诸“实践”就能解决问题，那还有一个“谁去实践？”“如何实践？”“什么叫实践？”等等问题。十年“文革”也是“实践”呀！大跃进也是“实践”呀！关键在于谁在左右实践的方向、规定实践的策略、总结实践的教训，并对其后果作出价值判断。于是又回到“谁”即主体性问题。离开了“谁”的问题，当年作为一种伟大实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能开展得起来吗？顺着这个问题去思考，便进入了后现代问题框架。如今，在欢呼迎接所谓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来临的时候，后现代批评最担心的是：如何保证思想／知识／智慧的“程序设计师们”不会通过垄断信息制造和信息筛选的大权来达到控制全人类的目的，并制造另一种宏伟叙事来为此垄断／控制提供合法合

理化的根据？坚持 80 年代“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启蒙叙事的人，还有后来转向“汉语文化”宏伟叙事的人，却将上述担忧或类似的担忧化简为不合时宜、不合国情的“杞人忧天”，客观上是“反科学”。至于说“民主”，他们似乎不愿正视有关民主的一个悖论性常识：十人一群，完全有可能包括了七个混蛋或庸才或道德理想主义者，“民主”的结果将是另外三个人（无论是天才还是傻瓜）的自由被剥夺。他们也讲“自由”，但是那种泛泛而论的“个人自由”，离雅各宾式专制只有一步之遥。希特勒是全民选举上台的。美国黑人是在民主制度下被剥夺了个人自由的。后现代批评对民主制的批判反思，是不能用“先补够资本主义的课”来打发掉的。民主说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life style），自由是生存的权利。在一个还弄不清自由的含义的语境中强行建构民主的架构，其结果可能比一个开明的君主的专制更可怕。80 年代喊民主，90 年代议自由。这正是在中国语境中从现代意识向后现代意识过渡的一个症候。

其实，后现代批评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它直到如今还无法解决的理论盲点。不错，共时性文本先在于经验性个人或群体，任何人都无权冒充“先验主体”而凌驾于文本之上。但是，文本本身不也有一个合法与否的问题吗？文本压迫人，怎么办？“压迫”是广义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剥夺某人的言论自由或送他进监狱。任何一种社会性文本，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成规，其目的就是要控制异端以求稳定。无稳定，一切都完蛋。但是，过度控制必然会扼杀想象力，反过来造成“熵”现象（entropy）。怎么办？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利奥塔的“谬误推理”，德勒兹（Deleuze）的“精神分裂”伦理，杰姆逊的“无中心的整体观”或“政治无意识”等等，都是西方后现代批评家开出的药方，有启发性，不一定有普适性。我倒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有可

能整合共时／历时的对立，至少可以在我们熟悉的视域内来拓展我们的视野。遗憾的是它被冷落了，成了只知道玩弄唯物／唯心标签的风派人物手中的专利。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显学的中国语境来讲，这真是个天大的反讽。在经济领域，倒有许许多多文本控制下求发展的生动例子。就文本与人的关系而言，整个80年代广东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见到绿灯大步走，见到黄灯快步走，见到红灯绕道走”。这就是聪明的广东经济人在全国这个大文本中求得高速度发展的胆识和策略。等到其他地区也想效法时，文本性质发生了变化，新的游戏规则制定了。而广东的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科，从整体看给人的印象却是：明明是绿灯高悬，还有人喊叫不许走，因为他们心里整天都亮着一盏红灯。这是一批几十年不变，专靠亮红灯，发红牌吃饭、升官、当专家、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的“灵魂工程师”。

“后现代”的另一种特征是走出了学术象牙塔，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铺天盖地而来、客观上在颠覆等级二元的拼贴型大众文化。我在《澳门对话录》中称之为“克隆文化”。拼贴现象，古已有之。后现代拼贴是指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在中国已成为事实；市场经济和高科技联手，以商业化为目的，成批生产各种各样的拼贴型文化制品。所谓的精神食粮，已沦为消费品中的一族。去“世界大观”之类的主题公园走一趟，是重复了美国迪斯尼式的文化消费，还是弘扬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消费，无可非议，前提是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称之为“精神文明”，不仅莫名其妙，而且是糟蹋马克思和孔夫子两位老祖宗。此类廉价宣传，是60年代假大空陋习在当代的延续。不过，理论的贫困和虚肿，掩饰不了后现代文化现象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高科技手段＝后现代文化的温床。对此文化现象，

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排斥或赞美都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坦率讲，我本人并不喜欢 MTV 式的拼贴——尽管少数也拼贴得不错。但是，我们能超越这个拼贴文化的时代吗？身处一个媚俗的文本中，我们能像道德／美学理想主义者断言的那样可以真正地出污泥而不染吗？不少以精英自居者，自己花钱买书号来出版只为少数人乃至未来人撰写的纯学术专著。前者是最俗的商业行为，后者是指向未来的崇高。这也是拼贴，两种行为模式的拼贴。“魔鬼”养活“上帝”，“上帝”教训“魔鬼”，历来如此。悟通这一层，对后现代大众文化也就不会大动肝火了。杰姆逊主张采用“顺势疗法”（homeopathy）：以拼贴来对付拼贴。^① 中国人大概会说“因势利导”。前提是：化解精英情结，悬搁导师意识，沉入到文本之中去与文本一道求发展。

为“后现代”正名，最大的困难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情结，尽管一直在喊叫要悬置意识形态偏见。如今，对后现代文化的兴趣和研究已等同于鼓吹后现代文化，研究者成了“后现代主义者”。为此，中国人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后主”。“后”，当然指各种“后学”：后结构主义、后哲学、后殖民主义等等，最后统到“后现代”名下。“主”又暗示了“教主”。比喻义则是：“谁最先引进‘后学’，为当代西学东渐立下了汗马功劳？”“后主”一词，形象地概括了部分新生代文人争夺话语权、瓜分学术地盘、企图重定游戏规划的欲望或潜意识。这是“假洋鬼子”集体无意识在当代的再现。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从收入本书的文章中，也可以挖出“假洋鬼子”来。麻烦的是它将对后

① 杰姆逊：《杰姆逊访谈录》，收入 *Postmodernism / Jameson / Critique*. Douglas Kellner 主编，pp. 59~60, Maiseonneuve Press 出版，1989 年。

现代问题的研究引入非学术的渠道，与后现代无直接关系的“学术政治”占据了争论的中心位置。它最多只能成为福科话语／权力理路中的研究对象。还是让我们返回后现代问题本身吧。

大名鼎鼎的利奥塔是一个后现代文化的鼓吹者吗？凡认真读过《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西文版的人——一遍就够了，因为他的文字一点也不晦涩，风格是分析型的——都会明白作者对后现代状况所持的态度不是热情拥抱，而是医生对病情的“诊断”（diagnosis）。这个世界有病。病状是多样的。普遍的病状是：科学／知识的功能发生了不利于人文精神或曰“精神文明”的功能性变化。科学（science）沦为被评论者称为“technoscience”的东西，即技术化和程序化的“科学”。现在，不再问“何为真？”而问“何为有用？”，由此通向“是否有实效？”和“是否卖得出？”真正的权力已不在传统意义的“国家”或“人民”手中，而在制定 technoscience 游戏规则的一群人手中。任何一种话语的游戏规则，都不可能自动地为自己提供合法化根据。那么，这种“科学”或“知识”如何合法化呢？^① 必须指出，利奥塔对后现代状况的“诊断”，与他的头号论敌哈贝马斯的意见基本一致。（从哈贝马斯那里汲取现代性灵感的中国大陆现代性张扬者们，却拒不承认我们已处于此“状况”之中）两人的分歧在于：开出什么药方来医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要重振启蒙运动传统。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的先验性“共识”观，是形而上整体论或两大宏伟叙事／元叙事的翻版——黑格尔传统的“思辨”型元叙事和法国“解放”型的元叙事，不但不是良药，而且会沦为 technoscience 的工具，并为之提供不合法

①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英文版，第11～12章，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的“合法化”叙事手段。利奥塔在书的导言中讲了一段已广为人知但容易误解的话：“简而要之，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毫无疑问，这种怀疑正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科学进步反过来预设了怀疑。”^① 请注意！不是利奥塔要怀疑元叙事，而是“科学进步”。“进步”，不是18世纪启蒙运动对“进步”的界定。“科学进步”到今天的结果是：以可以通约的优化系统操作为特征的当代 technoscience，是一种利奥塔并不一定喜欢的状况，决定了两大叙事的无效性。事实上，在论述过程中，他也时不时地以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心态与自己民族的“解放”叙事“调情”。但他首先要求正视现实的“病况”。他开出的药方是：多元化的“小叙事”，“谬误推理”和扩展知识的“非稳定性”。中心意思是：怀疑。于是，又有下面这么一段话：

All that has been received, if only yesterday (modo, modo, Petronius used to say), must be suspected.^②

Petronius 是公元一世纪罗马讽刺文体名家，modo 是拉丁文，汉译是“刚才”，后来演变为英文的 modern（现代，时髦等）。全句的汉译是：“所有被接受的，哪怕是昨天才被接受的（Petronius 常说‘刚才’、‘刚才’），也必须受到怀疑。”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汉语节译本却将它译成：“只要昨天（先在、先在 modo，佩特纽斯 Petronius 过去常说）必须受到怀疑，一切就都是可能被接受了。”^③ 这不仅人为地扭曲了利奥塔的原义，而且使得隐含在利奥塔后现代哲学观中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利

①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英文版，导言部分，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② 同上，P.79.

③ 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奥塔本人不一定会同意我的诠释——荡然无存：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性理解中必然包含了对它的否定性理解。正是这种马克思绝对不会反对的“怀疑精神”，让利奥塔紧接着又说了下面一段话：

A work can become modern only if it is first postmodern.

Postmodernism thus understood is not modernism at its end but in the nascent state, and this state is constant. ①

引文中的 modernism 是指文学领域内的先锋派现代主义思潮，不是涵盖面更宽泛的“现代性”（modernity）。句法简单，词义也清楚。汉译：“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成为现代的。按这样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现代主义的终结，反倒是现代主义的初生状态，而这种初生状态是永恒的。”含义一目了然：利奥塔将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视为永恒并将它转化为后现代哲学观的一部分。流行的汉译节本，不仅没有抓住这个要旨，反而让人觉得利奥塔不是思路不清便是故弄玄虚：“……照这样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在其最终目的上并不是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初期状态，因而这一状态是稳定不变的。”②众所周知，作为一位后现代哲学家——不是粉饰后现代而是研究和批判后现代，利奥塔视拼贴型大众文化为绝对的后现代垃圾，贬之为“现实主义”和“媚俗”。他主张的后现代时期的文学，就是与大众文化保持远距离的精英主义现代派文学。就现代主义文学而言，利奥塔和哈贝马斯两人的意见是惊人的一致。杰姆逊则不然。他首先是理性地面对／承认大众文化的现实，肯定它的平民性或民主内涵，尤其是它那种能让一般人都可以读懂的“讲故事”式的叙事手法。在提出“顺势疗法”的同时，他批评利奥塔的文学精

①② 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